

专题

← (上接 11 版)

最为重要的生活制度化体系 (systems of life regimentation)。同时他开始将这些研究与他之前的论点做对比,即新教这一世俗化版本的基督教信仰,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精神要求的形成有重大关联。

然而,在韦伯对中国的儒教与道教,印度的印度教与佛教,以及古犹太教做了大量详细的研究之后,他的研究课题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最初的关于资本主义的形成根源和导致的后果,从犹如格言一般的纲领性问题“如果没有新教思想,那还会有资本主义吗?”开始,他的研究升级演变成分析全人类文化中各领域的“理性化”的历史进程。不过韦伯最终并没有完成所有的分析工作。

几十年来,在韦伯对资本主义的前因后果做了一部分研究之后,他逐渐认识到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有着一一种普遍活跃的、全面的发展规律——理性化。在他早前对这一发展的需求及其文化意义的考察中,韦伯追溯了理性化在社会与历史现实的所有具体表现,如经济、政治、法律、宗教和文化。理性化,作为“我们时代的命运”(fate of our time),成为了韦伯对为数众多、又面貌各异的种种次级进程的统称,这些发展进程包括“官僚化”“工业化”“智能化”“理性的工业化资本主义发展”“专业化”“客观化”“方法化”“纪律化”“祛魅”“世俗化”以及“非人化”等。

仅仅是这些各式各样的标签就显示了,韦伯试图将这些完全异质的现象从高度分化的视角整合到他自己的研究视角——“理性化”视角中。因此,在对韦伯的研究中,明确标出所谓确切的“理性化”概念,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意义。除了在他的《宗教社会学文集》(Collected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第一卷中发表的那篇著名序言(1920年)之外,韦伯并没有系统地构想一个理性化规律,即使是在那篇前言中,他也只对一些中心问题有所阐述。

在韦伯的作品中,“理性化”在最泛层面上基本意味着秩序和系统化。一个混乱的、相互间充满无限联结的团体,根据人为制定的标准,有秩序地排列,这一系统地秩序化的结果便导向了那些韦伯称之为“理性化”的进程。

在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和文章后,马克斯·韦伯逐渐相信,他称之为“理性化”的这一系统秩序化的历史进程,是普遍且不可避免的。

起初,韦伯对于那些他认为更适用系统化和秩序化路径的领域,提出了“理性化”的假设,如经济、法律、技术、科学和国家秩序等,他称这些为“世界的外在组织”(external organization of the world)。在他对于这些领域理性化的研究过程中,韦伯主要思考了以下三个问题,而这三个问题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 1)为什么只有西方文明发展出了一套有着“普遍历史意义”的“理性”文化?为什么在欧洲以外,特别是在亚洲,这个有着更为古老的和多样化的文明的地区,没有发展出这样一套相似的“理性化”进程?
- 2)为什么“理性的”科学技术、“理性的”工业资本主义以及“理性的”政府官僚机构也仅仅在现代西欧地区出现呢?
- 3)“理性化”给相关社会和组织带来的好处有哪些?而社会、团体以及个人要为理性化发展付出什么代价?

在一项平行研究中,马克斯·韦伯也集中关注那些通常被认为是“非理性”的领域,例如宗教、伦理、艺术、文化以及性等。韦伯将这些领域称为“世界的内在组织”(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the world)。这些人类生活的社会和历史现实,不仅在过去、现在也被认为是,充满着出人意料的观点、自发形成的理论、超自然力量、神话和难解事务的领域。简而言之,就是非理性的、无序的、混乱的。

然而同样地,韦伯在这些社会文化领域看到了秩序化的进程,这些都被他归入“理性化”的范畴。例如:

1)韦伯研究了西方音乐的“理性化”,其记谱、和声以及乐器技术似乎都为音乐艺术中的“理性化”提供了佐证——它们逐渐替代、消解了音乐里的神秘、“非理性”要素。

2)韦伯考察了不同时期的多种文化中的宗教教派、狂热崇拜、救世信仰,从各个方面去挖掘存在于魔幻巫术中的“理性化”迹象。对于韦伯来说,理性化不仅仅适用于宗教的意识形态,同时也适用于其组织化过程,例如从小宗派发展到大教派的过程。

3)韦伯还分析了人类性行为的历史发展过程。人类性行为一般被认为是个体性的、混乱的、动物性的,可即便如此,韦伯仍认为其同样属于社会驱动的理性化范畴。在世界各宗教中,生殖崇拜活动都逐渐消失,性行为逐渐系统化、理性化。从狂喜狂欢的混乱关系逐渐趋于稳固的伴侣关系中的“有序的”性。这种关系可以是

以婚姻状态、准婚姻状态、稳定的伴侣关系或恋爱关系的形式存在。不管是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母系社会还是父权社会,这其中都存在着秩序。

无论马克斯·韦伯看向何方,他都看到了指向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伟大的理性化过程的确凿证据。

然而,对于自己发现并详加研究的理性化,韦伯从未描绘出其具体的推进轨迹,一个遵循既定模式的单线发展过程。他一再声称历史现实只可被分析描绘成各种理想化建构的混合物,重复强调非理性化的发展,这应能使得韦伯免于被称为对进步盲目乐观的宣传家。如果赋予“现代化理论”(theory of modernization)以“进化论”的内涵,也即将世界或至少人类的历史描绘成一个日臻完善的理性主导世界——那将是对韦伯思想的误解。

正是因为韦伯声称的“理性化”进程具有不可思议的“偶得”特点,且不断地被“非理性的”发展所打断,使得他深深着迷,终其一生研究这一课题,并将其应用到各个领域。

像韦伯这样不遗余力地钻研各种理性化进程中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并给出清醒的、怀疑又悲观答案的人,是不会把人类生活中各方面的“理性化”描绘成令人向往的、积极的情境的,更不会以此来为资本主义时代带来的后果开脱。“理性化进程”提高效率的同时,也产生了影响深远的非人化——韦伯致力于将非理性行为“理性化”,但他深深的怀疑主义和对“非理性”的恐惧(在“无理”“非人”的意义上),都将他免于为非理性现象开脱的谴责。

这样一个不懈地分析、发现、强调“非理性”动机和“理性化”后果,并警告其潜在的“非人”后果的人,被指责为一个对单一、命定的“理性化”机制的盲目崇拜者,是不公平的。

4. 如果你不愿意通过科层制讨论非人化,你最好对理性化进程保持沉默。

如前文所述,韦伯的怀疑悲观论调是不可能让他将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理性化进程描绘成一幅美好画卷的。他在研究理性化的过程中,不仅看到了效率的提升,同时也敏锐地发现了那些有着深远影响的“非人化”、“客体化”和“去人格化”等。

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和科层制不可遏制的发展势头,使得韦伯产生了深深的恐惧:人类是否仍可拯救出尚存的一丝个



《经济与社会》手稿,约 1919 年。从上面可见韦伯持续不断的修订,实际上一直持续到他去逝前不久。

体主义倾向?民主在未来将会发展向何方?这就是韦伯对于人类文化整体的关怀,以及人类生活的自主选择权的思考,而这两方面都使得他变得越来越悲观和怀疑。

5. 文化批判和对时代的诊断

这一部分是我关于马克斯·韦伯普遍理性化“大叙事”概述的最后一步。最终,韦伯关于人类生活各范畴的普遍理性化的大叙事,不管在过去还是现在,都令他成为诊断现代性的最著名学者之一。

总的来说,韦伯关于人类活动各领域的无法阻挡的、宿命般的、普遍的理性化叙事,也就是

韦伯编织进他个人对人类社会发展愿景的叙事,其实并不是他大部分研究工作的有意为之的指导性主题。只是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突然暂停研究工作时,韦伯才产生了对未来的强烈的悲观思想。

简单概括来说,马克斯·韦伯的伟大叙事,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意想不到的成功,却带有启示意义的讽刺。16、17 世纪的激进新教徒为找寻从永恒地狱中获得拯救的普世信号,参与创造了一套信仰与行为准则,这套体系后来逐渐在全球范围建立起人类服从与束

缚的围场。

特别是,当最后一批最虔诚的新教徒都脱离了原有的组织体系之后,在 19、20 世纪之交,现代的、理性的、布尔乔亚式的工业化资本主义以不可阻挡之势显露了出来,经济生活中的资本主义规律和人类生活中处处体现的科层等级秩序形成了紧密联系,即便不会带来最终的毁灭,也必定会威胁到所有人的个体自由。

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正是在 19、20 世纪之交这样的转型大背景下,发表了这样的悲观叙事,他一步步地对自己的愿景感到怀疑,直至他学术研究的最后时刻。到了 21 世纪初,韦伯的叙事被认为极具启发解释力,使得他的理性化叙事似乎优于他的其他叙事理论。

只是遗憾的是,韦伯的社会理论研究的结论是悲观的,他在生命的尽头还是认为,等在人类面前的并不是有如夏日风光的繁花似锦。

(作者 Dirk Kaesler 为德国马堡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本文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马克斯·韦伯基金会主办的“中国现代文明语境中的马克斯·韦伯”会议上的发言,原题为“普遍理性化:马克斯·韦伯的大叙事”。本报特约复旦大学德语系胡梦霞对作者进行访谈如下)